

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张研 /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郝秉键 李志军 著

19世纪晚期

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

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张研 / 主编

19 世纪晚期 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

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郝秉键 李志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 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 郝秉键, 李志军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ISBN 7-300-06751-4

I. 1...

II. ①郝...②李...

III. 知识分子 - 思想 - 研究 - 中国 - 19 世纪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0927 号

19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

张 研 主编

19 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

——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郝秉键 李志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m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0.25 插页 2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3 000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19

世纪

中国社会研究

总 序

19 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

总 序

19 世纪晚期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处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风雷激荡、色彩纷呈。整体上的中国社会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嬗蜕。

嬗蜕，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道路，而且展现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方向。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样处于亘古未有大变局的今天，在

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展现出多种可能性方向的今天，对于 19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了国内外史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

以往对于 19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多具有“前后割裂”、“上下脱节”的缺憾。

“前后割裂”，是指以鸦片战争作为分水岭，将中国社会历史割裂为两个不同时段进行研究。事实上，鸦片战争的“冲击”，并没有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崩溃。鸦片战争前后到甲午战争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经济仍然基本沿着固有的道路前进；鸦片战争前后到太平天国爆发的数十年间，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着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双重统治的格局。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古代”、“近代”的分期，似乎是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长期以来，“前后”研究割裂，后段的“近代史”学者不了解前段的“古代史”；“前段”的“古代史”学者不了解“后段”的“近代史”。“前段”、“后段”均难于立足中国历史的实际，从整体上全面研究和把握中国特有的国情及发展道路。

“上下脱节”，是指对上层政权以及处于表层的“突发事变”、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与对基层社会以及处于中层、下层的人口、物价、生产、生态、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研究脱节。中国历史研究历来的热点，在上层政权和与上层直接密切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人物等。近十几年研究热点开始下移，转向基层社会和与下层直接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生活、民俗等。从“头重脚轻”到“上下并重”，应该说，反映了历史研究的重大进步。但或许是刚刚起步的原因，目前诸多研究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下研究脱节的阶段。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人们仍对 19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孜孜以求。这正符合近年来中外形成的社会史研究潮流。社会史研究潮流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同欧洲中心史观受到空前挑战、同各个国家民族试图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不同发展道路等均有密切关系。而中国，随着经济转轨和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化,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更加迫切需要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它们的发展脉络,更加迫切需要从历史渊源上揭示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2000年9月,本课题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获教育部正式批准立项,项目名称为“19世纪的中国社会研究”。2003年初,本课题纳入211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子项目。

本课题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传统国情和特有发展道路的认识;从实践上提高人们在社会转型期间应有的历史素养;从学术上将19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史料发掘、结论论述等各个方面均推进到新的水平。

本课题研究将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把19世纪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单元,以更宽阔的视野,全面研究和把握中国特有的国情及发展道路。本课题研究将以基层社会研究为重点,同时有意识地注意避免西方新史学忽视上层政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摒弃对历史规律进行必要总结、研究趋于细碎化的倾向,将下层研究与上层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地方研究与全国研究结合起来;将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对比,以期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本课题研究分社会控制(《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社会风尚(《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社会结构(《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社会保障(《救荒与济贫——中国社会的救助活动(1750—1911)》)、社会弊病(《晚清的陋规》)、秘密社会(《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六个子课题。本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便是上述各个子课题研究专著组成的“19世纪的中国社会”研究丛书。本课题纳入211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子项目后,又将补充拓展部分研究成果:《晚清嫁妆研究》、《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研究》、《咸同年间的社会变动与朝野政局——以“捻”与“剿捻”为中心》、《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



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这些分批出版的专著，分开来，是对 19 世纪中国社会某一个方面的深刻透视，不乏新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体系；合起来，是对 19 世纪中国社会的高层次的面面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和实践意义。

作为课题主持人，我希望这套丛书不但能够填补 19 世纪中国社会整体研究领域的空白，以理论突破、学术创新面向有关专业读者；而且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发挥重要的参照作用，以具有借鉴意义、实用价值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

作为课题主持人，我谨在此向我的同事和良师益友秦宝琦教授、郭成康教授、陈桦教授、孙燕京副教授，向参与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董建中博士、牛贯杰博士、毛立平博士、刘宗志博士表示由衷的敬意；谨向领导和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教育部有关部门及领导，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及领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总顾问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基地主任成崇德教授，向精心策划和组织本课题最终成果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贺耀敏先生、王学敏女士、周蔚华先生、孟超先生，向赐教或即将赐教的各位方家学者，向关心这一研究的所有同行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研究在深入。

在从必然到自由的艰难历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跋涉和攀登。

张 研

2002 年 3 月

谨识于北京知春里

19

世纪

中国社会研究

19 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

目 录

54		章二第
87		章二第
111		章三第
111		章一第
130		章二第
137		章三第
141		章四第
141		章一第
169		章二第
173		章二第
181		章五第
181		章一第
191		章二第
200		章三第
202	前 言	1
210	第一章 上海格致书院的教育创新	10
211	第一节 独特的管理模式	11
212	第二节 灵活的经费筹措渠道	21
231		章三第



	第三节 新型的教学模式	27
	第四节 多样性教育功能	35
第二章	西洋观	42
	第一节 西学观	43
	第二节 西政观	87
第三章	实学教育思想	112
	第一节 实用目的的人才教育思想	113
	第二节 实效方式的教育观	130
	第三节 实理理论的学术教育思想	137
第四章	国防思想	147
	第一节 对欧洲列强与周边形势的认识	148
	第二节 对中国安全与防务战略的讨论	167
	第三节 对中国海陆防务战术的分析	177
第五章	重商思想	187
	第一节 “商本论”思想	188
	第二节 改定税则思想	192
	第三节 “争夺利权”思想	200
	第四节 “商学”思想	207
第六章	实业思想	210
	第一节 土货论	211
	第二节 交通论	217
	第三节 矿业论	231
	第四节 企业论	234

第七章	财金思想	245
	第一节 国债思想	246
	第二节 货币思想	250
	第三节 银行思想	265
附 录		278
	一、格致书院西学课程表	278
	二、上海格致书院课艺征引书目表	281
	三、上海格致书院特课与季课历年优奖课生名表	289
	四、格致书院课艺一览表	292
主要参考文献		307
索 引		310



19

世纪

中国社会研究

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

前言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与激烈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相对应，中国思想领域也“新奇百出”，呈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首先，西学沿着由技术器械到政治制度再到人生哲理的轨迹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从“船坚炮利”到牛顿力学，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说到培根、笛卡儿的科学思想方法论，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与激烈的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相对应，中国思想领域也“新奇百出”，呈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首先，西学沿着由技术器械到政治制度再到人生哲理的轨迹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从“船坚炮利”到牛顿力学，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说到培根、笛卡儿的科学思想方法论，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从洛克的政府论、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穆勒的逻辑学和斯宾塞的社会学，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费希特、施蒂纳、尼采的哲学思想到大仲马、莎士比亚、王尔德、狄更斯、雪莱、拜伦、歌德的文学作品……一时间，“夷狄”文化打破“夷夏之防”，萦绕国人的脑海、耳际，汇成“用夷变夏”之势。

其次，新旧思想观念相互撞击，中国几千年来一向墨守的“内夏外夷”的文化观、亘古不变的天道观、尊圣崇经的知识观和忠孝信悌的伦理观摇摇欲坠，而“师夷长技”、效法“西政”、穷则思变、“六经皆伪”等新的价值观念潜滋暗长，一发而成时代之潮流。这一“潮流”滥觞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推其波，认为中国不仅没有“船坚炮利”，而且“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①；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助其澜，提出效法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弄其潮，既发出“民本君末”的呼声，又发出“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网罗”的呐喊，还引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孙中山、邹容等则汇其流而扬其浪，以“三民主义”为大旗，最终把天赋人权论、三权分立说和共和方案播撒于中华大地。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发生震荡。具体体现为：“今文经学”的兴起，康有为将今文经学思想从学术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为政治制度改革制造舆论，将公羊三世说同西方进化论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明末遗民的思想复活，一时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受到关注，反对空谈误国，提倡经世致用，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抨击君主制，主张排满兴汉成为时代话语；沉寂多年的“王学”抬头，其提倡独立思考、人人可以为圣人的思想，被人视为与西方培养独立人格的思想殊途同归，成为“铸造现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

代国民人格的依据”。

对于晚清之思想变局，学界已多有研究，然其论域所及基本是活跃于晚清政坛之“大人物”，从“开眼看世界者”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到“启蒙思想家”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王韬，从洋务活动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到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再到革命活动家孙中山、邹容、朱执信等，成为研究晚清思想者之基本素材。“大人物”站在历史的前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其思想构成思想发展史之主潮，也直接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之发展趋向，值得认真研究；但主潮毕竟不等于思想的全部，在研究者纷纷关注主潮的时候，非主潮的、一般民间人士的思想的研究往往成为思想史的缺环。

在传统社会，民间思想之传播与影响范围固然极其有限，但思想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受众的多少，还取决于时间的淘洗和发展的检验。有的思想风靡一时，日后却成为历史上的笑柄；有的思想，在当时鲜为人知，到后来却大放光彩。因此，挖掘鲜为人知的民间思想，不仅可以从历史的后台来审视历史思想，进一步窥见历史的真实与全貌，而且有助于填充思想史研究之缺环。

民间思想异常丰富驳杂，欲理清其发展全貌，实非易事。因此，本书把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史籍，一时难以全面收集，因此本书对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探讨不拟全面展开，而仅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力求通过分析上海格致书院师生的言论，来透视当时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我们之所以选定上海格致书院为研究对象，一则因为该书院在近代中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颇具代表性；二则因为该书院留下一套比较完整的思想史资料——《格致书院课艺》，可供研读。为便于探析格致书院知识群体的思想，有必要在前言中先对上海格致书院之原委作一概述。

上海格致书院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是经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由麦华陀、傅兰雅、唐廷枢等中外人士共同创立的。



格致书院之创立，与当时教育形势是合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由于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师夷长技以自强，因而“西学比从前更为紧要”^①，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的主题。有鉴于此，一些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西方官员、传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便萌发了在华创建科技学校的念头。1872年12月26日，《北华捷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俗的传教士”（Secular Missionaries）的文章，建议那些热心于在华传播西方文化的外国人，在上海建立一家专供华人服务的阅览室，这个阅览室应配备中国经典著作和科学实用知识，陈设西方新发明以及机械图说，用以启发来访者的好奇与兴趣。^②正是受此文的启发，1873年3月，麦华陀率先倡议在上海集资创办一所学校，“凡西书之翻译为汉文者，皆备置院中”，专供华人学习科学技术，“冀各商士踊跃掖助，以成是役”^③。

此议披露后，社会作何反响，详情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因此，麦华陀决定继续推动其事。1874年3月，他分别在《北华捷报》和《申报》上刊出建立书院的详细计划和办院章程。章程共计十五条，规定书院由中外士商共同捐资创办，专供“中国士商所用，西人不在其列”，书院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度，办院目的是“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人事，彼此更敦和好”^④。麦华陀深信这样的书院“将最能对中国人的头脑发生影响，使他们了解并熟悉外国人的思想、生活和机械器具”^⑤。

正是由于麦华陀的动议反映了中外有识人士之夙愿，所以其办

① 《格致书院第一次记录》，《万国公报》第3册，1558~1564页。

② Knight Biggerstaff,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ttempt to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 (2), May 1956.

③ 《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④ 《申报》，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⑤ Knight Biggerstaff,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ttempt to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 (2), May 1956.

学章程一经刊出，便得到传教士傅兰雅、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等人的积极响应。1874年3月24日，麦华陀邀集一些热心于此举的人士在沪召开会议，筹商创设书院之事。会议决定成立董事会，推举西人麦华陀、福弼士、伟烈亚力、傅兰雅和华人唐廷枢等五人为董事，负责各项筹办事宜。^①正是由于创办格致书院之举切中时需，所以其计划一经付诸行动，便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官员的有力支持。截至1875年9月，书院共募得经费现银6 979.83两、洋钱1 541元，其中白银5 313.5两、洋钱600元属于中国官员捐助，分别占总数的76%和38%。

在众董事的苦心经营和中外各界人士的资助下，上海格致书院终于在1876年6月22日正式开院。从倡议至开院，上海格致书院的筹建历时三年之久，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更让创办者所始料未及的是，开院后上海格致书院建设又一度陷于停滞，迟迟不能招生。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时华北遭逢旱灾，全国各地官绅及在华西洋教士倾全力劝捐赈济，无暇顾及书院建设；二是当时书院发生人事变动^②，影响书院之进展。直到1879年，书院才出示招生，预计在1880年初开学授课。其时距麦华陀倡议建立书院已经六年有余。嗣后上海格致书院步入教学育人阶段，其间书院之运营主要由傅兰雅、徐寿、王韬“三位灵魂人物”操持。其中，傅兰雅始终从事其间，致力最勤，用心最专，贡献最大；徐寿初期参与筹划，联络官绅捐款，始终其事，直至去世；王韬于1885年受聘为书院山长，课士评文，极尽心力，影响颇大^③。随着傅兰雅赴美定居（1896年）和王韬的去世（1897年），上海格致书院如失臂膀，尽管有西籍董事丹文，华籍董事张焕纶、赵元益

① 参见《万国公报》第3册，台北，台北华文书局，1558~1560页。

② 1876年，书院创始人麦华陀退休回国，改由江海关税务司吉德接替；不久吉德辞退，改请律师丹文继任。同时，伟烈亚力亦返英，并改聘教士玛高温继任。

③ 参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9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等人竭力维持，仍难以挽回其颓势。1911 年书院停办，其地基房舍由租界工程局创办中学。至 1914 年 10 月，终告结束。

在上海格致书院兴办前后，中国的书院多不胜数，有传统的、西式的、教会的、外侨的，但没有一家书院像上海格致书院如此特别。它由外国人倡议，又有中国人参与；虽有中国官员的支持，又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具有中西兼容、官民合办的性质。作为“中国近代新制教育之滥觞”和“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上海格致书院自其倡议筹建到停办，历时达四十年（1873—1914 年）之久。其在教育方面之创新，后文将作系统阐述，其于社会之影响则不可谓渺小。

首先，上海格致书院为中国社会培育了一个新式知识群体。从《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和《格致书院课艺》看，格致书院已建成以西学为主，旁及时事洋务的新型课程体系，历次考试的题目或是询问西学以诱导于新知识之讨论与理解，或是询问时务以诱导于时务局势之分析批评，与旧式书院之学习与考试内容形成鲜明对比。经过格致书院的训练，一个新式知识群体成长起来。关于上海格致书院的学生人数并无确切记载，但据熊月之统计，格致书院课艺共奖励 1 878 人次，以此而推算，其学生估计不下数千。对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数千人并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数字，但对整体上保守的晚清知识界而言，能够有数千人倡导西学、研究时务，亦堪称难能可贵、引人瞩目之奇事。19 世纪晚期，可称得上“群体”的西学研究、传播者主要有二个：一是在洋务企业或在学堂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上海广言馆中供职、学习者；一是上海格致书院师生。前者是官方的，后者是民间的。二者联系密切，共同构成当日中国知识界的新学载体，为以后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在西学东渐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格致书院的优等生如叶瀚、赵元益、瞿昂来、钟天纬等还成了后来变法运动的积极分子。叶瀚曾主编《蒙学报》，发起组织“蒙学公会”，抨击“自君权一尊，积



威压制，而人人失自主之权与自便之利”；赵元益参与创办《新学报》，在王韬逝世后主持上海格致书院，创立上海“译书公会”、“医学善会”，著有《儒门医学》、《光学》、《西药大成》和《法律医学》等，其中《西药大成》是当时最大的一部西药译著，《法律医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西方法医的著作。瞿昂来是《经世报》的编辑；钟天纬曾任《时务报》撰稿人，后又参与创立自立会。项藻馨创办中国最早的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先后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大清银行代理总办等职。

其次，上海格致书院开风气之先，对书院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格致书院开办期间，其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颇受社会关注，不仅作为素材被写进小说^①，而且作为“新型学校的样板”，为一些通商口岸效仿。光绪元年（1875年），厦门创建博闻院，一意仿照上海格致书院章程及规模。在宁波，道台薛福成也仿效上海情形创设格致书院。1895年，康有为走访格致书院，详细了解了其办学情况，把它作为兴办近代新式教育事业的典范，以充实其变法中教育方面的内容^②。唐才常也曾考察了上海格致书院的情况，计划购买上海格致书院翻译诸书及仪器，在浏阳建立格致书院，并提议在各地推广格致书院。

再次，上海格致书院推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格致书院的主要使命“全在于启发新知，使人更能认识西方进步景况”^③。为了普及科学知识，格致书院一方面解答来自各方人士关于科学知识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其机关刊物《格致汇编》为媒体进行科学知识的介绍。据记载，某一时期格致书院接待的访客平均每月达100人左右^④，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1876—1892年，《格致汇编》总

① 参见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贴书生谈会党》。

② 参阅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7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③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31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④ 参阅《上海格致书院的第三次报告》，载《北华捷报》，1883-4-18。

